责任编辑：叶 婷 021-59928800转510 Email:yeting1203@126.com

艺史探幽

清王敬铭山水图轴

□ 金晓红

嘉定博物馆藏有一幅嘉定首位状元王敬铭山水图轴。此幅画纵153.5厘米，横65.5厘米，是一幅未完成的画稿，或是王敬铭生前创作的最后一幅作品。

山水图轴　　王敬铭

王敬铭（1668—1721），字丹思，一字未岩，号味闲，今上海嘉定人。清康熙五十二年（1713）状元，授翰林院修撰。自幼喜文学，尤嗜诗词书画。康熙四十六年，皇帝南巡，王敬铭献画后承旨，入值畅春园，充武英殿纂修。进士及第后，康熙夸耀说“是朕一手培养出来的”。王敬铭“诗好义山，后学东坡，间信长吉”，其画取法宋元四家，山水学王原祁，清腴闲远，书卷之气，溢於纸墨，为王原祁四大弟子之一，闻名于世，人称“书画状元”。

此山水画虽为未完成作品，但架构已成，山峦、岩石、树木错落有致，亭台、屋舍掩映山间，构图饱满，疏密有序，层峦叠嶂，气势壮观。尤其是画上留白处同邑清史学巨擘钱大昕及王鸣盛的题跋，为此幅作品的考证提供了有力的依据，几位史学巨匠在尺幅之间的笔墨交流，使得此画更显神秘和珍贵。

钱大昕（1728—1804），字晓徵，号辛楣，又号竹汀，乾隆十九年（1754）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累官少詹事，督学广东。后历主钟山、娄东、紫阳书院，专心讲学和著述。为乾嘉学派大师，著有《二十二史考异》等。钱大昕跋曰：“未岩修撰早为麓台入室弟子，笔法苍劲，晷晷欲度骅骝前。登第未久，即赴玉楼之召。尺素流传，人争宝之。此本虽未完，而架构密致，一展阅间，如见经营惨淡之迹。鹤溪主人其善藏之，勿为好事豪夺也。”后附七绝诗四首：“缣素风流数太原，奉常墨妙启儿孙。麓台已老耕烟死，又见吾乡画状元。”“浴堂西畔早修书，红杏诗才小宋如。几辈句胪矜第一，评量能事要推渠。”“买画金多胆太豪，纷纷赝鼎散人间。匡庐真目谁能识？一幅模糊未了山。”“衣钵当年付阿谁？残缣断楮尽堪师。督邮善马何人赏？地下休笑济叔痴。”诗后标注“鹤溪于修撰为诸父行”，落款为“乾隆己丑（三十四年，1769）二月廿日，钱大昕观，因题句”。

王鸣盛（1722—1797），字凤喈，一字礼堂，晚号西庄，别署耕养斋主人。乾隆十九年（1754）一甲二名进士，官侍读学士、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光禄寺卿。也为乾嘉学派大师，著有《十七史商榷》等。王鸣盛跋曰：“此幅乃吾家未岩殿撰所作未成本也，笔意规仿黄一峰老人，苍秀生动，可云具体。未岩归道山后，笔墨流传者已多零落，大幅尤为难得。此虽未成，丘壑已备，吾弟宜善藏之。己丑（乾隆三十四年，1769）长夏，西庄鸣盛题。”

二位史学大师的题跋中提到，此画的收藏者为“鹤溪主人”，王鸣盛称其为“吾弟”。据《光绪嘉定县志》载，鹤溪主人应为王鸣盛之弟王鸣韶。王鸣韶（1732—1788）原名廷谔，字夔律，一字鹤溪，诸生。其古文清简，画亦雄秀，诗列“江左十子”之一。钱大昕于诗文后标注“鹤溪于修撰为诸父行（读hang）”，诸父即伯父或叔父，王鸣韶虽比王敬铭小60多岁，但却为王敬铭的叔父辈，这对于研究同为王姓一族的王敬铭一支和王鸣盛一支的渊源提供了佐证。

除钱大昕、王鸣盛题跋外，画轴左侧绫边上还有近代余绍宋的跋。余绍宋（1882—1949），浙江龙游县人，号越园、樾园、别署寒柯，1910年毕业于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民国元年任司法部参事，平生旨趣尽在金石书画、画学论著、方志编纂，为近代著名史学家、鉴赏家、书画家和法学家。余绍宋跋曰：“是幅得钱竹汀、王西庄两先生题识，始知为未岩殿撰所作。未岩者，嘉定王丹思先生之别号也。《画征录》、《百幅庵画寄》诸书俱载其别号为“味闲”，唯王安甫《昔梦录》作“未岩”，盖“未岩”“味闲”音略同，别号固不妨别写耳。先生之画出于麓台，故笔法酷似，然亦别具风格。其遗迹传世极少，巨幅尤罕见。此幅为未完之本，殆始作于将殁之前，弥足珍贵。而章法谨严，勾勒轮廓具见骨力，似更胜于平昔所作。钱、王两先生所称信非虚誉。吾友新之先生于先生为族裔，而西庄先生之五世孙也，生平于其先德所遗刻意搜访，往曾刊《先泽残存》若干卷行世，志趣可知。顷复以重值收得此画，持以示余，属为加跋，谓将以贻子孙。余甚喜其志，以为足以风末俗之忘本蔑先者，故乐为题之，又不第赏析画之高妙也已。丁丑（1937）仲春之月，龙游余绍宋记于杭州寓居之寒柯堂。”

由以上跋文可知，此画最先由王鸣韶收藏，其间可能几易其主，所幸王鸣盛五世孙王新之生平寻访先德所遗，得知后花重金购回。王新之（1879—1963），名元增，字新之，王鸣盛玄孙。光绪二十四年（1898）中秀才，后因科举制度的废除，王新之东渡扶桑，赴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日本警监学校，受学于著名监狱学家小河滋次郎博士。回国后他积极推行监狱改良，曾任奉天地方检察厅检察官，民国元年首任京师第一监狱典狱长。他著有《日本监狱实务》、《北京监狱纪实》、《中国监狱之沿革及现今状况》、《监狱学》等，可以说是清末民初狱制改革的倡导者和实行者。民国初王新之和余绍宋都供职于司法部，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所以请余绍宋作跋也在情理之中。

1962年王新之先生将此画捐赠给嘉定博物馆。在几代人的精心呵护下，王敬铭山水巨幅完好无损地重新回到家乡，在这里得到了更为妥善地保存、展示、研究和传承。这或是此墨宝最理想的归宿，亦是对先人最好的慰藉。

民国时期嘉定黄草编织业的生产与销售

□ 郑宣文

草编织品源于新泾桥一带（今上海市嘉定区徐行镇永胜村），起初仅蒲鞋一种款式。清同治年间，嘉定草织业不断发展，形成了以徐行镇为中心的黄草编织区，并成为本地农民一项主要的家庭手工业。民国时期，随着从事草织业的人数增多，工艺品种不断革新，嘉定草织业在国内外都具有一定影响力，为徐行镇以及周边地区的外贸经济带来可观的效益。

清末明初，随着洋人入市，徐行草编有了走向世界的契机。民国三年，意大利斯曲罗斯洋行聘请徐行当地人汪季和、嘉定县绸布业公会主席朱石麟为代理人，向徐行农民直接收购产品，转销东南亚和欧美各地，开嘉定黄草织品外销之先河，年销售总值达10余万元。

民国八年，为振兴本县传统手工艺品，朱石麟、陈奉璋等集资1万元在徐行开设兴业草织公司，经营外销业务，并在澄桥设立织工传习班，聘请当地技师徐荣卿传授技艺，学徒达千余人。之后，徐行镇相继开设达利、大华、振兴、新华等草织公司，各公司在徐行当地集资收购织品，再转手销往上海等地，并不断推出新品，仅拖鞋品种就有无花纹的白拖、蝴蝶托、彩条拖、龙拖、童拖等，拖鞋衬底厚实，做工细致且穿着舒适，还有精美的文来、提包、信插、笔筒、钱袋、坐垫、杯托、台毯、草帽、玩具等十余种，这些产品兼具美观性和实用性，有着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所以非常畅销。特别是兴业草织公司所编织品，质量上乘，价廉物美。当时，朱石麟聘请邓承维德为经理，邓承取“化整为零”的营销方式，将贩售织品的20余人，也兼作收货员，并给予他们非常可观的提成，每天能拿四五千文。邓又订立了店规，统一价格，剔除劣货，所售商品质量上乘，赢得消费者的信赖，“竟将柳条提篮、绿布衣包及纸皮拖鞋等日货压倒，使之绝迹沪上”。

民国九年是黄草织品发展的鼎盛时期，式样种类与日俱增。在冬春两季农暇时，徐行一带每日产量达二三千斤，草编织品除在国内销售外，还运销南洋欧美，年销售额达70万元左右。“老幼编工，日得银七角至一元以外”，在当时也是一笔可观的收入。但好景不长，民国十一年，兴业草织公司首先倒闭，后起者也有部分歇业，这些公司只图一时之利，不谋团结一致，滥收贱卖，致使销路不畅。

与此同时，也有一批新的草织公司兴起，这些草织公司在徐行当地开草织厂，设销售点于上海城区。比如民国十一年，嘉西乡仓桥村的蔡永和在上海民国路（今人民路）老北门开设大华草织公司；民国十六年，朱文祁等在上海吉祥街（今江西南路）开设同义祥草织公司；民国十九年，陆洪纶在上海法大马路（今金陵东路）设立华成草织公司，他与外国洋行，进出口公司等机构签订合同，生意非常兴隆。民国二十年六月，铁道部在北京召开物资交流会，华成草织公司应邀参加，次年又在青岛召开物资交流会，对黄草织品内销起很大作用。这些新兴草织公司的产品除销售于各大城市驻沪采购站外，还扩展到南洋、欧美等地。据统计，当时澄桥、徐行、樊桥三乡编织者超过3000人，织品式样和色泽颇多创新。

当时也有一些瞄准黄草编织业的小贩，按照时节从农民手里狠杀价格，收购产品。当地的歌谣形象地记载了商人剥削农民的场景，比如“清明七月半，蒲鞋降一半”，“做捆蒲鞋实在难，清明时节落雨来，蒲鞋老板发横财，籴米不够买糠菜”。这些小贩从本地收购后，肩挑手提到上海，住宿于五马路（今广东路）天福旅社，该旅社是各地草织商贩集中过渡场所，“每年运往上海，转运宁波、福建、广东及南洋等处，为数极大”。

民国二十一年，“一·二八”事件发生后，日军从浏河登录，沿新泾东岸抵达徐行北市梢，徐行等地黄草编织业也受到一定影响。次年，流通渠道堵塞，出口锐减，徐行的草织公司相继倒闭。之后，虽经嘉定著名人士吴春泉、蔡永和，陆洪纶、吕舜祥、潘指行、胡叔常等奔走呼吁，成立嘉定黄草织品改进会，但因利益冲突，收效甚微。

黄草编织品

抗日战争爆发后，通货膨胀现象严重，物价飞涨。由于私商控制市场，产品收购价格极不稳定。价格最低的民国二十四年，卖掉3只提包只能换4两豆油，5双拖鞋只能换1市斤大米。无地及少地的雇农、贫农家庭，借草编织品的收入补贴生活费用，“走遍全区，贫寒人家之家用，半赖于此”。当时，陆洪纶仍以合理的价格收购，保持农民的青黄织品收入，提高生产积极性。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草织品外销渠道中断，国内市场也因多年战争无消费能力，陷入困境，境内黄草编织业奄奄一息。不少草织公司的产品积压在仓库里，损失巨大。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黄草织品改进提倡无人，贩售者互以劣货低价向外商争销，大失对外信用；此外，当时麦编制品开始流行，不少黄草织户转向麦编，加上战乱不止，一直到解放后，黄草编织业才开始振兴。

综上所述，民国初期以徐行镇为中心的黄草编织业是走出国门的地方特色工艺，也是地方经济活动的缩影。20世纪20年代黄草编织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达到顶峰，后历经战争、外销中断等因素，黄草编织业开始走向式微。一直到解放后，政府重视并支持农民恢复黄草编织事业，才复出生机。

责任编辑：徐征伟 021-59928800转601 Email:xuzhengwei19670216@126.com

从国丈园到秦家花园

□ 周其确

明代崇祯年间（1628-1644）嘉定出了个周皇后，她的父亲周奎是娄塘人。据清光绪《嘉定县志》记载：“周奎字云路，居娄塘。以女庄烈皇后封嘉定伯。二子皆封五军都督。赐第苏州葑门。”关于周皇后，《娄塘镇志》上这样讲：“明末庄烈愍皇后周氏，系周奎的长女，世居娄塘瞿家弄。天启中（1621-1627），周氏选入信（明思宗崇祯皇帝朱由检未即帝位前封为信王）邸。后宫中选大婚一名，周氏以二贵人陪升中选，封为信王妃。思宗帝即位，立为皇后。崇祯三年（1630）封奎为嘉定伯，妻丁氏封伯夫人，赐第于苏州葑门。后周奎家迁居该地。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八日都城陷，遣之出宫，帝令后自裁，遂先帝崩。福王是谥孝烈皇后，世祖章皇帝定鼎改谥为庄烈愍皇后，与帝同葬田贵妃寝园，名曰思陵。”周皇后是娄塘人，因此娄塘就是皇后故里。

周奎作为崇祯皇帝的国丈被封为嘉定伯，因崇祯皇帝的赏赐，在苏州葑门一带有了新的宅第。但是除了这个宅第外，周奎在嘉定其实还有一处宅第，这个地方称为“国丈园”。史载周奎不忠不仁，他瞒着崇祯帝，经常去皇城向周皇后伸手索取金银财宝，依仗国丈之势，向地方上索取财物。在崇祯帝后期，国库空虚，曾密谕周奎倡捐输饷，而周奎作为国丈却说“老臣安得多金？”而李自成攻取京师后，在周奎家“追赃七十万，籍其家时又抄出现银五十三万两，杂器匹缎车载”（《甲申纪事》）。周奎在嘉定城中南大街上建造的“国丈园”，其规模很大，从原来的封家弄往北至张马弄的胡氏旧宅“延和堂”（该堂是胡厥文之父胡雪帆所购置的旧宅）。

国丈园的南部有“小山堂”。小山堂前有演戏台，戏台一侧有“福”、“禄”、“寿”三星石，是造型精美的太湖石，堪与“翥云峰”相媲美。在国丈园的东部有明代嘉定四先生之一的娄坚所书的“小墨池”刻石在园洞门上。小墨池石刻的园洞门西面有五间平房，与北京秦元璇大姐所绘制的《嘹城秦园图》相吻合，在抗战时期有一个叫“仑士仁”（读音）的日本老师就住在此间。至清乾隆年间，国丈园归于秦家，园也改称“秦园”。

对于国丈园，就我个人认识浅谈几点如下：

1930年代，秦家花园的龙墙

1，据《明史》记载，当年李自成的军队逼近京师时，周皇后曾告知崇祯帝“吾南中尚有一家居”。这座“家居”，只能是一座崇祯帝并不知道的嘉定园宅。

2，周奎后被李自成官兵所杀，他有支后裔逃归嘉定，代代相传，至今尚存。当年与汪望农、戴贯吾二位社会贤达，共同在南下塘街开设盐公堂的张鸿年先生和他的后裔都知道嘉定有周奎的后裔。当年在南大街沈家桥西堍开设一家小米店的沈伯仁先生，他的夫人就是周奎的后裔。我所知沈伯仁先生有一个女儿沈善英，沈善英的丈夫顾耀年先生，二位都是勤业中学的老师，如健在均已是百岁老人了。

3，园中有龙墙（见附图）。这不是想当然就可以建造的。凭秦少游的后裔出了二位进士、一位兵部侍郎，显然是不能够的。

嘉定老乡镇名称拾趣

□ 章丽椿

嘉定商业繁茂、物产丰富，是江南的鱼米之乡。清末民初时，包括城区在内，嘉定县时有澄桥乡、樊桥乡、小红庙乡、广福乡、马陆乡、南翔乡、陈店乡、江桥乡、封浜乡、纪王庙乡、诸翟乡、真圣堂乡、石冈门乡、方泰乡、黄渡乡、安亭乡、望仙桥乡、钱门塘乡、外冈乡、六里桥乡、白荡乡、西门乡、严庙乡、葛隆乡、娄塘乡、陆渡桥乡、徐行乡、曹王乡、庵桥乡、唐行乡、新庙乡、吴巷乡、西胜塘乡等三十四个乡镇。后因建制变化，有些乡镇已经归并或划出，加上城镇经济的飞速发展后出现的新貌，许多乡镇名称已成为历史上的一页。但从它们的命名上，可以寻觅到乡镇与行政建制、地标、庙宇、商行、姓氏、河流和桥梁等的关系，其中也蕴藏了不少掌故和轶事。

嘉定镇是以建制命名的老镇，早在春秋战国期间，今嘉定的练祁河畔（现西门老街一带）已有人类活动，唐代时称为练祁市，南宋嘉定十年（1217）建县后，现在的嘉定镇当时便是县治所在地。清嘉庆以后本县以厂设治，宣统年间以外城河为界，老镇被称为城区。民国三十六年（1947）称为嘹城镇，解放后设立城厢镇。1991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列为上海市四大历史文化名镇之一。2000年9月，嘉定镇撤镇建街道，不久老镇将迎接它800岁的华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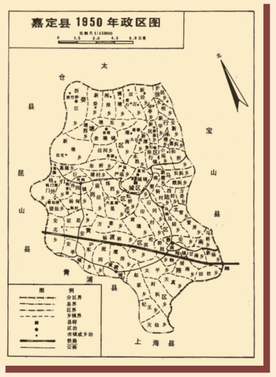
石冈门乡、外冈乡、黄渡乡、安亭乡、西门乡等，均是以地标命名的乡镇。石冈门原是唐代的水利设施，乡名也就冠以石冈门了。嘉定镇西面的外冈，是上海成陆较早的地区，外冈的古冈身，原是远古海岸线的遗迹，由于冈身外就是浩瀚的大海，所以得名外冈，外冈也获有“上海古外滩”之称。位于嘉定县南面的黄渡镇，本是吴淞江畔的千年古渡，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自古就是吴淞江上的重要港口，俗称“铜黄渡”。安亭位于嘉定、青浦和昆山之间，是秦汉时期的古驿站。解放后原属青、昆的部分划入嘉定，现在安亭已成为上海的汽车制造基地了。西门乡原为康熙年间的西门厂，宣统年间改为乡，其范围包括现嘉定镇西面的村落，以及朱家桥、外冈镇、娄塘镇的部分土地。

嘉定全境河网遍布，一些乡镇以河流、湖泊命名，娄塘河和钱门塘均是人们熟知的河道，娄塘乡、钱门乡由此得名。白荡乡位于境西南，在现嘉定工业区的牌楼、虬桥附近，因原有水泊名白荡而得名，旁有集落称为白荡村。西胜塘乡位于青浦、昆山间，四周环水；是典型的江南水乡，境内有西胜塘镇和白鹤镇，建国初期时属嘉定县西胜乡管辖。1949年10月，吴淞江南划入青浦，北面为现安亭的吕浦地区。

嘉定一些最初的集落，是由各姓氏的人群自然集聚而成的，这些姓氏就成为乡镇名。嘉定南部的封浜，据考源于明朝成化年间，因福州知事封本的父亲、官封承德郎的封淳隐居在此，后人把这一段吴淞江古道（现虬江）周围的村庄统称为封家浜。现经史料证实，封家浜早先是吴淞江上著名的商埠，民间还有“先有封家浜，后有南翔镇”的说法，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也曾驻扎在此。明隆庆年间应天府巡抚海瑞主持下疏浚河道，吴淞江下游改入黄浦，封浜逐渐衰落。位于嘉定南的马陆镇，因有马、陆二姓居住此间得名，另说是南宋马军司陆南大居住地，清末时马陆以马陆塘打铁桥为中心形成小集市。1935年随着沪宜公路建成，马陆逐渐崛起成为市镇。今冈行区的诸翟镇，因诸、翟两姓得名，解放前分属于上海市和嘉定县，明代时称诸翟市，因村西沿堤多紫藤，故又称紫薇村、紫堤村。

嘉定有一些地名先是以姓氏命名的商行，后来转成为乡镇名。徐行乡是明朝徐冕所创，清代为“市街南北一里，商店二十余家系侵晨贸易之集市”，时称徐家行。随着黄草编织品的兴起，徐行成为远近闻名的草织品集市。位于嘉定东北的唐行，系明万历年间唐姓在黄姑塘北畔首辟杂货、花行等商铺，该地俗称为唐家行。民国时期，唐家行有18家行当、25家商号和11家摊贩。吴家行位于黄姑塘东北部，早在元末，有吴姓避难于此设行。清嘉庆十一年（1806）在此设粥厂，救济灾民。吴家行因此作为行政建制，因街市沿黄姑塘边排列如巷，不足半里，人称吴巷。至民国元年（1911）设吴巷乡，乡镇中心设在高庙，现属唐行镇华亭联五。位于方泰东南部的陆家行，明万历年间已经成镇，因陆姓人多，遂以姓为镇名。民国初年时，该镇以浅江（西江）为界，西属青浦，东为嘉定马陆，解放后陆家行的青浦部分划嘉定管辖。

嘉定民间自古就崇尚佛、道，许多乡镇的发展均与寺庙有关。南翔在嘉定县东南部，萧梁时建白鹤南翔寺于此，因寺成镇，南翔镇是南翔寺发展的产物。严庙乡得名于青冈横沥东的严家庙，庙内有房屋九间，供奉朱隆司和朱隆裕，内有嘉定举人周保璋的题额。葛隆的名称据清光绪《嘉定县志》及民国《嘉定县续志》载“葛隆因庙而得名”，但历史文献上并无葛隆庙，故此说存疑。小红庙乡因境内有供奉孝女杨九孃的松林庵，也称小红庙而得名。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置小红庙厂，宣统元年（1909）改厂为乡，戬浜镇时属小红庙乡。1959年建立城东人民公社后，戬浜镇是公社的行政中心。梁天监二年（503）嘉定镇西境的盐铁河附近，建造了方泰寺。市随寺兴，人群渐增形成集市，当地人们流传“先有方泰寺，后有方泰镇”。唐时方泰称“西里”、“泰里”或“锦里”。元代时寺边的村落被称为方泰墟，方泰乡一名由此延续至今。曹王庙始建于南宋淳熙十三年（1186），原名曹王祠。曹王传说不一，其一说是庙内供奉曹植，另说是供奉的是唐曹王明，现较多人认为庙内供奉汉将曹参；曹参随刘邦起事后，功勋卓著，后继萧何为汉惠丞相，获有“萧规曹随”的美誉。因香火渐盛，百姓聚而居之，清光绪年间遂形成曹王庙镇。宋元间，吴淞江潮汛肆虐，江畔居住着7户纪姓渔民，名七家村（纪王村的前身），为消此灾祸，立纪王庙，祀汉将纪信以镇之。随着烧香的日益增多，后来成了集镇，称纪王庙市。清乾隆年间称纪王庙镇，属嘉定县管辖。1958年后纪王地域划归上海县管辖，现为冈行辖区。新庙乡位于嘉定镇东北部的华亭泾西岸，占地三亩，有房15间，清嘉庆十一年（1806）在该地设粥厂，宣统元年（1909）改新庙乡。真圣堂乡因境内真圣堂得名，真圣堂位于横沥西侧张泾之南，堂内供奉汉萧何塑像，庙前有跨张泾的石板平桥，人称真圣堂桥，系知县於一芳于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重建。距此不远便是闻名遐迩的天恩桥，桥为三拱石桥，俗称“大桥头”，后来被因误称真圣堂桥，真圣堂前的小石桥由此称为“小真圣堂桥”。天恩桥西南侧另有石板平桥一座，长约20米，宽却不足2米的纤桥，与天恩桥成曲尺形，形成了双桥，别有一番情趣；该桥现在已经列为嘉定区不可移动文物。民国期间原属于嘉定的广福，最初是临海的村落，叫做江家宅。元时印度僧人普慧在此地行船遇海难，被当地村民救起。为报答救命之恩，普慧在此建造寺院，名为普慧禅寺。在寺院落成大殿仪式上，普慧高诵“宁残身，广施福”，于是普慧禅寺又称为广福寺，江家宅也随之改名广福镇。1953年，经苏南行政署批准，将杨泾西的原为嘉定县所辖的镇街划归宝山县，结束了一镇两县管辖的局面。真如镇街道位于嘉定东南部，1984年11月，由嘉定县划归普陀区。真如寺原名“万寿寺”，俗称“大庙”，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



嘉定县1950年政区图

以桥梁命名的乡镇中，望仙桥乡已为人们耳熟能详。澄桥地跨新泾河，又名新泾桥，桥身为石平桥。明万历年间，练祁河北岸，已成为棉花、土布及草织品集散地，因桥得名为澄桥乡。六里桥跨鸡鸣塘，距嘉定、外冈、方泰均为六里，故名。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设六里桥厂，后与白荡乡、练西乡合并，原乡域在今六里、果园及方泰顾溇村部分。樊桥乡位于嘉定东，在今徐行、曹王，境内有跨华亭泾的范家桥及樊它数处，民国期间范、樊混用，因而数度出现不同乡名。今徐行的范桥、小庙及曹王的施庙、和桥，均为原樊桥乡域。庵桥乡在娄塘北，因跨双塘的庵桥位于永庆庵的庙桥之西，故得名庵桥。江桥跨横沥，最初建于北宋，后来镇随桥而得名，因此“江桥镇”自北宋迄今已有800多年历史。明弘治十二年（1499）桥重建后，称永镇桥（俗称中石桥），即今江桥。陆渡桥在娄塘北，跨老浏河与太仓为界。清嘉庆二十年（1815）设陆渡桥粥厂，宣统元年（1909）改称乡，原乡域在今娄塘、朱桥及太仓的嘹东乡。现在的朱家桥乡原是严庙乡，咸丰十年（1860）8月，由于太平天国东扩战事的波及，不少人来此避难，渐成集市。人们将原跨于娄塘河上的石桥（原名生生桥）称为朱家桥，镇随桥而得名为朱家桥镇。民国三十五年（1946）抗日战争胜利后，因青冈横沥东有严家庙，朱桥易名改称严庙乡，至民国三十七年（1948）恢复为朱桥乡。全镇地貌如同头向东南、尾在西北的金鱼。2003年1月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朱桥今属北工业开发区。

上世纪前期嘉定的区域与今日相比，已有了巨大的变化。当时老乡镇的名称折射出的建制与自然的特点，以及丰富的人文历史，仍不失为今人研究的题材。

名迹钩沉